

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09年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

目 录

求实篇

- 1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姚力文 刘建平
10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郭道晖
1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一家言

- 22 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杜 光
26 重新定义公有制……徐 建
28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 源
34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王克明

人物志

- 38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43 大学者束星北……方 朔
48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往事录

- 54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周燕琳
60 “麻雀”有故事……雷 颐
63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邢同义
67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林贤治

怀人篇

- 69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郑青如
73 狱友陈子谷……季 音
77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品书斋

- 79 读牟宜之诗……李 锐

古今谈

- 82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王铁群

编读窗

- 87 读者来信摘登……含辛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竟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本期： 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 姚力文
刘建平

一、同一个“新民主主义”潜在的倾向性分歧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思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等也有论述，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注意到，党的七大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国际政治判断是战后美苏合作，国内政治构想是与包括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但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阵营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新特色。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召开政协、成立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一方面说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要“点明一句话”，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要“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资产阶级的“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但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到理论思考，继续坚持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论。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谈的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总方针”下具体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虽也承认夺取全国政权、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又明确指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应是“经济竞争”、“和平的竞争”，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我们今天与资本家的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看谁经营得好”；“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要发展供销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另一方面，要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好高骛远、强迫命令、报表邀功，必须是自愿参加、自由退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国家工厂的经理”。据报道,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既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

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严峻困难,也曾使毛泽东的思路有所调整。在刘少奇赴天津前夕,毛泽东4月7日起草中央给华东前线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指示说:“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

机器条件。

1949年1月接管天津、北平之后,两市财经困难、生产荒废,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北平更多,而有些干部对民族资本家有“左”的情绪。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而造成困难的原因除战争外,工人、店员在解放后大搞“清算斗争”导致资方疑惧、开工不足,是为“突出问题”。于是,刘少奇在4月中旬来到天津视察,特别强调: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2页)。他在对干部、工人、资本家的讲话中,反复说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阵线”,工人与资本家有矛盾,但“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要做到“劳资两利”,搞好关系、发展生产。他设想:建设新民主主义,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就成为

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收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刘少奇视察天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也谈到了同样的政策思想。4月15日,毛泽东接见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笏等人时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四面八方”缺一方面,“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明显调整。

二、信念超越党规国法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国革命、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总结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对此,邓小平曾经以“天津讲话”为例高

度评价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在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时候不犯错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并且确实发生了“左”的倾向。我们渡江后，就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作为开国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什么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总原则，以及为什么回避提出社会主义前途。《共同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宪法化，它使源自六大的“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论”思想受到抑制，甚至连毛泽东的所谓“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革命转变论”展望也受到了抑制。

在《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作出实行人民民主、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人民享有广泛自由权利规定的同时，作为开国法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政协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执行人大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包括就国家的根本大计和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国家政权，有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规定国家施政方针等职权，其下属的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关。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均由多党构成，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是多党联合、人民民主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根本保证。对于人民民主政治，刘少奇的态度诚恳而严肃。他在1949年9月15日的政协党组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在政协会议中怎样具体行动？在议会斗争中行动得不好，就妨碍路线、政策的执行，这是要考究、要学习的。2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中共“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政协，和各党派团体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共同纲领包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回避了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因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但是，随着建国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习惯势力和“革命转变论”思想很快又恢复了生机。

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针对许多农民在经济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单干”、“对组织起来感苦恼”、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等不愿意被编在互助组的现象，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指出：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而做到这点则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高岗在讲话中虽然谈到“允许单干”、“允许雇工”、“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但他又强调：“这绝不是说”对“单干”放任自流。他具体要求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先、优待政策，断定互助组能胜过单干。很显然，面对农民要求“单干”的现实，高岗坚持着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实现合作化、集体化这样一种政治信念，而不愿意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他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路线问题，并决定动用政府掌握的经济、技术资源制造出符合其互助组“胜过单干”这一政治信念的经济现象。

在这里，问题的要害还不是人为地制造“组织起来”与“单干”之不公平竞争的条件，而是原来设定的发展合作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具有工业提供机器的条件等等限定，已经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与否的意识形态判断压力下开始模糊和淡化；相应地，一种基于个人信念而干涉农民自由权利的欲望，代替了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实证分析和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所谓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就被空洞化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高岗所谓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乃“歧视单干”，而更为“实质”的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这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

刘少奇对东北的非新民主主义动向提出了严肃批评。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结束之后，东北局组织部于12月31日作出《农村支部



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全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工作指示》,其中批评党员“只想个人发财”、“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要求教育党员“大量在合作社入股”、积极参加互助合作,以“引导群众组织起来”。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为批复东北局而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能够单干就很好。而且也不要以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刘少奇还批评提出“剥削问题”和“富农党员问题”是过早了,强调:“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意见,中组部正式答复了东北局。但东北仍然把高岗的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并

大作宣传;结果,几个月内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强制入组达70%—80%,而退组则受到惩治性的扣留财产或罚款与劳役。

高岗之所以敢于抵制中组部的指示,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他在东北党的会议上公开指责中组部指示是错误的,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与高岗辩论,高岗便说穿是“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使得东北局“一边倒”向高岗(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薄一波也有回忆说,高岗“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这样,中央决策层内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毛、高默契形成。

在东北的农民要求单干和富农党员问题导致中央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发生了比东北更严重的涣散解体危机。土改后的山西农业生产普遍恢复、发展,到1950年底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而农民群众特别是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要求“自由地发展生产”而不愿意组织起来,这种“单干”思想导致互助组“涣散、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

为了坚持集体化方向,1951年2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试办“征集公积金”、增加“按劳分配”因素的农业合作社。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为彻底扭转目前互助组织涣散解体的趋势,必须使之“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实行“出组不带”的“公共积累”和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很显然,山西省委已经根本不再顾及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机器条件和文化条件,而着眼于以超经济的行政

强制,对农民设置一个单干固然自由、但退组即意味着放弃被征集的公共积累这一两难的利益困境,甚至借此否定个体土地所有权,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致富愿望而就范于“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这里,意识形态本位的社会主义信念取代民意、民生本位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权力强制逻辑出现了。

但华北局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就在山西省的报告酝酿期间,《人民日报》于3月17日发表社论阐明华北局的观点,要求“党政领导机关应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春耕生产上来”,并提醒要“在自愿两利原则下”发展互助组织,反对号召和强迫一般互助组搞所谓公共积累。在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主持华北局日常工作的刘澜涛又专门请示刘少奇,刘少奇反对在尚不具备农业机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动摇私有制、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于5月4日批复山西省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给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作报告,在介绍中央“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时,特别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以明确界定,他说: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十年以后建设得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他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现在要搞社会主义改造,指出: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幻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我们中国的党内有很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6月3日,刘少奇在华北局当面批评山西省委,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三马一车一犁”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现在对富农没有什么限制,将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后,可以采取税收、价格、工会等办法加以限制。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

心。凡办事要重多数,少数人拥护的事是不能推广的(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22页)。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纪念建党30周年,从贯彻党的政治领导的高度批评“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警告说: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发展互助组必须反对强迫命令,不能反对个体农民“单干”,对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样,刘少奇、薄一波和华北局捕捉到“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仅从社会主义的信念出发而缺乏法治自觉和理论思考能力的问题,希望从政治工作入手对干部加以约束,阻止权力的超法律运作。7月3日,刘少奇把山西省委的报告批示印发给各负责人阅,指出该报告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

两天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批评山西省委不顾现实工业条件而破坏私有财产制度为左倾冒险。他说:所谓“对农民私有制又动又保护”是不对的,“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羊被杀掉,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动摇,不能削弱,要去稳定。”在上述理论准备和宣传工作背景之下,华北局于7月25日向中央做出《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阅后加以修改,其中着重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意见,指出:山西省的做法“是根本违反互助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等价原则的”。互助组的巩固主要依靠充实生产内容,如此便“在农民中就进行了一种实际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必需的思想基础。”刘少奇加写的这句话强调了在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教育农民”,而不是设置利益困境、搞行政强制或进行侵犯农民自主权的思想规劝,进一步明确了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是利益驱动机制而不是强迫性的利益困阻机制。

然而,就在中央审批华北局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出面站到了山西省委一边,开始实践“革命转变论”即他本人所谓“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他首先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

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是华北局7月25日报告被搁置。他又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在9月下旬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亲自审改会议通知，指导会议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从组织上掌握了领导农村工作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扫围绕“互助组涣散趋势”的烦人争论而直接肯定农民有“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把简单劳动互助、常年互助组、实行土地入股与公共积累的生产合作社，总结成由低级到高级在集体化方向前进的“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建立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运动前景。这个决议草案作成后当即在10月间发给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很快得到高岗、河北省、华北局的积极反应。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实行，把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经过一系列的会议组织、政策制定与传达、指导步骤，毛泽东消除了刘少奇批评和阻止东北局、山西省提高互助组织的影响，推动农业集体化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而刘少奇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积极研究和直接领导，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就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指导思想。

尽管毛泽东取得了从农业集体化运动突破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主导权，但这一政治运作过程却是非法的。对照起来，1950年6月土地改革是以政协讨论同意中共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合法程序施行的；这是开国法统规定的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委员会立法、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行政的宪政制度，可谓多党议会立法、联合政府行政。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法，由共产党组织系统实施的，乃一党立法、党内行政的违宪行为。这是完全的以党代政，当然也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据开国法统而论，就是僭越的立法、非法的行政。并且，即使从党的法规而论，互助合作决议也是非法的。根据七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最高立法职权，经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央指

导机关”，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集体领导享有最高行政权，因此，作为改变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启动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重大决策，立法程序应该是由书记处、政治局提出议案，经过充分讨论之后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至少由中央委员会表决。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让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决议，这种会议当然不具备党内立法资格。不过，即使在这样的会议上，决议草案和开会方式也遭到与会者的非议。1951年9月20日，陈伯达主持由除西南局以外各中央局派人参加的中央互助合作会议。他拒绝与会者汇报各地互助合作运动情况和问题的要求，而是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后就讨论他起草的决议，但仍有代表不同意陈伯达所谓农民具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尤其是被认为“熟悉农村情况”而特邀到会的作家赵树理，声称农民“热心单干发家”而不愿意搞互助合作组织，使得陈伯达很不耐烦。但无论如何，陈伯达草案还是通过了。而这样一个“草案”，毛泽东竟然以中央名义指示各地党组织“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且，这个未经任何具有全党立法权威会议通过的“草案”，在1953年2月15日经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通知》就“成为正式决议”，而他所举的理由为“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这完全是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上，使党代会立法、集体领导变成了议行合一的个人集权。

纵观这一党内立法过程，可以说闪烁着惊人的权术谋略，其要义乃行政会议立法化和立法会议行政化，从而达到立法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目的。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而委托陈伯达召集地方党组织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是党内的上下级之间的行政性质会议。与会者即使有许多反对意见，最终也不能拒绝或根本修正“毛泽东—陈伯达草案”，而是要服从领导即不得不通过它，因为，这一草案在被讨论之前就已经具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了。而具有了这一“通过”的程序外衣，“毛陈草案”也就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合法性——它似乎是来自各地方部门的集体意见，符合党制定政策所必须具备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原则，因此它疑似议

决性质的立法。而对于中央核心决策层(政治局、书记处)——在党法上,其成员之间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不存在必须绝对服从的上下级权力关系,以共同制定政策,体现集体领导——这一具有准立法权的会议(或传阅)而言,所面对的文件是毛泽东召集的疑似全国性质的会议已经通过的文件,因此是必须同意的文件;即使有异议,也不可能从原则上推翻它。如此,本来成员之间可以平等发表意见的立法会议,就变成了必须服从所讨论文件的行政性质的会议,但这一会议(或传阅)却使文件最终获得

了“中央”的合法名义。二者衔接起来,“差级会议”——参加互助合作会议的地方代表必须服从中央(毛泽东)的领导,是为行政性权力差级会议;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必须服从疑似具有全国代表名义的互助合作会议,是为体制性权力差级会议——的立法程序便告完成,使通过党组织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合法依据。但是,无论“不断革命”如何克敌制胜,如此的废置国法、擅越党规已经不是合法行政、秉公求治的政治,而是以强行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为目的的谋权用术。

在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启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事实上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后,毛泽东于1952年9月底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明:从现在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泽东遂于6月1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但如何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取代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并成为党内的共识?毛泽东不是组织民主讨论表决立法,而是靠党内斗争推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而所谓的“财经会议”正是高岗向薄一波、刘少奇斗争的会议。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等积极串连,向负责修正税制、主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发难,而高岗攻击薄一波,采取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的1949年天津讲话、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批评、1951年对山西互助合作问题的批评等等统统扣到薄一波的头上,搞“批薄射刘”,企图推倒刘少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在1953年秋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判常务副部长安子文为名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的领袖地位不会由于一次仓促发动的阴谋斗争而动摇,结果高、饶“倒刘”不成,反而在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并最终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不过,在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旗帜下高岗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因此刘少奇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和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检讨高岗攻击他的那些“错误”,表示对“毛主席的想法”的服从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积极认识。很显然,高饶斗刘虽然失败,毛泽东解除刘少奇阻碍、推翻新民主主义政策却成功了。而且,高

岗之所以认为刘少奇将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动摇,除了他发现毛、刘之间在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还有更隐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泽东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安排东北局第二书记、组织部长张秀山落实。高、饶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长罗瑞卿追究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张秀山被加以“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但毛泽东作为“查档事件”的主使并没有受到相应的组织批评,而关于刘少奇奉天被捕一事,当时的满洲省委向中央作过报告。倘若在追查“高饶反党联盟”时对毛泽东暗中调查刘少奇奉天被捕情况有所批评,或许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在刘少奇这一问题上以逼供制造假案的悲剧了。

如此,毛泽东用曲折复杂的党内斗争手段“解决”了最高领导层向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统一。之后,由周恩来于9月8日向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并在9月中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阐述总路线。其间政协委员梁漱溟为农民叫苦,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人的批判。毛泽东甚至称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要求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以利于“在全国讨论总路线”。国家政治生活如此之荒唐,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竟然把本来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变成批斗会场。以此为象征,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制度和机构被废置。这样,过渡时期总路线没有经过任何立法程序,就终结了新民主主义制度。

三、新民主主义夭折是刘少奇和新中国的悲剧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党内资深的农村工作老领导杜润生指出:毛泽东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以后反右、反右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的和谐遭到彻底破坏。”(杜润生《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整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2

期,第14页)这是新民主主义研究的政治学体会和思考。

“抛弃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成功了,为什么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呢?因为权术可以谋国治人,但不能治国服众。1951年,针对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搞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违背了党的政策和《共同纲领》,毛泽东曾经派陈伯达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面对如此的无上权威姿态和蛮横强词夺理,党内干部或只能服从,但落实到农村,则一再遭到农民抵制,干部强迫则发生名之曰“阶级斗争”的社会冲突。甚至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秋季以后,不少地方还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相当多的干部也怀疑所谓“优越性”,结果不得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冷战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解散农村集体生产组织。而更为可悲的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宣称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实现,编造统计数字、报喜不报忧的谎言政治在党内发展起来;当党内不能容忍劳动浪费、生产效率低下弊端和大量人口饿死惨剧的正义力量试图揭发“人祸”时,这就涉及毛泽东主导的社会主义政策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最终导致毛泽东发动清洗“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式暴力政治,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新中国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如果说毛泽东强行终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基于理想的信念政治和党内盲从领袖的迷信政治,那么后来则由于信念、盲从的后果不良而堕落为竞相作伪的谎言政治;最后,由于党内存在不能承受谎言政治的道德压力的健康力量,谎言政治遂转变为暴力政治,以非法的专政手段解除谎言可能被揭穿的危机。这是以权术破坏新民主主义共识导致国家政治认同破裂和党内政治混乱的必然结果。

那么,怎样的政治才是合理的,能够治国兴邦呢?民主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进入君权神授意识形态崩溃的近代以后,人民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公民的国家这种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即国家统治权利可以被接受的法则;民主主义的价值共识决定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这已经被证明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通政治原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理,即建立了在新民主主义共识的基础上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认同。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并因此反对过早、更反对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维护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以使中国人民能够在安定的民主政治秩序中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所以,刘少奇虽然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同奋斗成果,所以他是严肃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是诚实践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还有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也认为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是“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开国法统贯彻了全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价值共识,并因此确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府政治认同。如果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等所主张的人民本位、法治立国的原则,可以预期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当会顺利发展,如果其后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是“趁穷过渡”,如果是在人民民主立法、自愿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权力强制的专制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可能发生谎言“跃进”、大量饿死之类的荒唐事,怎么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全面内战”和所谓“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呢?

历史的悲剧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毛泽东虽然公开主张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联合政府,但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寻找机会、争取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甚至不顾忌开国法统的承诺:1951年支持非农民阶级的干部们以行政权力动摇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1952年指示中央统战部“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间阶级”;1953年阅改批发了由胡乔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求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一般干部宣传,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这样在事实上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排除在了“人民”概念之外,完全背弃了新中国的《共同纲领》。这不是诚实的、法治的民主主

义、制度主义态度。正如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质问的:“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政治骇浪六十年》,内部印行2005年版,第70页)这实际上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呼吁。当政治失去了合法性之后,人民就会实行抗议、抵制或不服从,即使是“天天讲阶级斗争”和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无济于事。而且,那些“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本身也是无效的思想空转或非法的政治迫害。事实上,那些思想空转和政治迫害也是民族的历史悲剧:“阶级斗争”即使扩大到把刘少奇等开国元勋迫害致死的程度,也不能达到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即使反复再三,也不能阻止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国家经济的贫困化。

随着毛泽东的离世,“不断革命”呼啸列车停止下来。而随着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见天日,刘少奇的悲剧即作为个人时间的历史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创造性思考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惟因没能够坚持初衷、抵制强权,新民主主义的天折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经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刘少奇已经获得了荣誉的历史地位。不过,作为国家民族的悲剧不可能随着为刘少奇平反的政治仪式和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新肯定而简单地结束——因为国家共同体意义的历史是连续的,新历史的创造需要新价值的论证、新思想的奋斗和新政治的创造。新民主主义夭折的悲剧所反证的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正确性,还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共同体的根本法则这一政治学原理。只有在对历史悲剧的反思中重建了诚实的法治道德和可靠的民主制度,由于“不断革命”造成的政治结构破坏和社会冲突伤口才能逐渐愈合,中国才可能真正摆脱社会冷战的泥沼,走上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的坦途。

(姚力文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曾为刘少奇秘书;刘建平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 郭道晖

一、评所谓“反右必要论”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2008年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

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

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



1957年国庆游行的场面

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所谓“反右必要论”,固然出于主事者的回避责任,更在于不愿正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这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0年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抓“AB团”“第三党”的党内残酷斗争中,大搞逼供信,就发生了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时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被杀光,夏曦还辩解道:“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受打击后,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

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上见笔者保存的本组会议记录和其他组的“简报”)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重大罪错。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和“身后名”的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死地。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考虑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

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将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记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并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二、整风原旨在防腐保江山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

这是初级层次的理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对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领导人民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清华大学党委举行的一次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记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

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



反右时期的宣传画

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事实上当时也未必有此预谋)。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

在下去。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

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作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

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近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我们党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表明,他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三、整风也有意敲打不同政见者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也还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

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在社论最后送毛主席审阅的时候,他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两年,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夏,毛泽东亲赴南方,在主持召开了

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的青岛会议后,还派出了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指令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他当面指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虽加抵制,还是不得不批了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才过关。而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则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这就是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2—18),指出这个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

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2期目录

书屋讲坛	《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刘再复
流年碎影	纸墨寿于金石	
	——《俞润泉书信集》编后	李南央
	纪念俞润泉同志	李 锐
	往事只堪哀	朱 正
	“江山何必庸人说”	钟叔河
口述历史	王汎森教授访谈录	张春田
思史佚篇	民国文人的秦淮河书写	吴润凯
	“身体”叙事面面观	
	——现代诗学问题之一	王耀文
裁书刀下	庄子二题	王 蒙
	何德之衰	李家真
灯下随笔	陕北说书: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	狄 马
	潇湘地,湖南人 霸蛮茶	秦燕春
书屋品茗	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安德鲁·维尔德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评价	董国强
人物春秋	雨中的普林斯顿	姜异新
	美国市长	盛禹九
	从“害群之马”到“独行侠”	陈 伟
前言后语	远游者的沉思	
	——《刘再复海外散文选》序	林 岗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

● 李维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举行了座谈。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工作。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建党问题。开始对于使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名称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名称,陈独秀完全赞成。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同时起草了党纲,11月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成员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据8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在《党史》中列出了17个名字,除上述8人外,还有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领导广州建党以后,李汉俊和李达在上海先后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第8卷1期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并且编印《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与此同时,党在上海办的又新印刷厂,当月印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组

织工会,支持罢工与组织集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和北京支部,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与陈独秀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步伐。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五一”节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何孟雄等人分乘两辆汽车,在街上挥舞“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旗帜,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小册子和传单。邓中夏这一天也赶到北京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8月16日,李大钊联络北京和天津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20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张申府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成改造联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因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40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青年团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很快转为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在党的一大之前,李大钊还派张太雷去天津、高君宇去太原、邓培等在唐山,进行建党建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武汉支部,是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的。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写信,后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建党问题。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带着中国共产党党纲,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刘伯垂主持了有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支部

成立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推选包惠僧任武汉支部的书记。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武汉支部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包惠僧等在会上讲了话。与此同时,汉口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1917年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还有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以及谭平山、彭湃、阮啸仙等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数万工人和学生当晚一起提灯游行。5月4日和7日,又先后举行纪念五四救国一周年和国耻纪念日大会。这些活动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罢工、罢课此起彼伏,1920年广东、香港两地工人罢工就有17次以上。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在广州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他们在北京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于1920年底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参加建党的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利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了解和推动广州的建党工作。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拿到这个组织中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激烈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长沙和济南的早期组织有不同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是这样写的：“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何时、何地、由哪些人组成，没有具体表述。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希望中国组建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1921年1月1至2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会时，围绕革命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言时曾提到巴黎“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但大家没有就建党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没有提到在湖南建党的具体情况。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新民“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他提到的8个人中包括易礼容。1997年易礼容99岁高龄去世时，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生平中说：“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88年和1989年，我曾两次访问易礼容。他很明确地对我说：“湖南的党组织是1921年何叔衡和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建立的。此前在湖南只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没有党的组织。”他还说：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在人们戏称为“30节”那天，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这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的“1921年10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我是成员之一”是吻合的，但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大概是党史中所说湖南在1920年建党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建立的时间，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在这里学习后来与刘少奇一起去莫斯科的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1987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载有彭述之的一篇题为《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的文章。提到1920年9月他在长沙与贺民范相识，当时贺已近60岁，但自嘲为“老少年”，真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通过他的学生罗亦农与陈独秀建立联系后，陈独秀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彭述之说，当时在湖南教育界和青年中贺民范是无可争辩的首领。据史料记载，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在1921年1月13日举行的。

关于党的一大前济南是否有党的早期组织，史学界的争论更大。过去一般史书中都说：1920年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从北京去上海时，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对济南建党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维经斯基在济南会见王尽美等，是1924年入团后转党的丁君羊，和1927年入党的杨一辰提供的一种传闻，他们两个都不是当事人。1920年参与建党活动的罗章龙、李达、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均未谈及此事。特别是维经斯基本人1920年6月和8月17日写的两封汇报信中，都没有说他曾去济南，相反地却讲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中说：“到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接着分别叙述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7个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其中没有济南的地方党组织。因此，在1921年5月之前，也就是在1921年春天之前，济南有没有

党的组织,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人认为,既然山东派了王尽美、邓恩铭去上海出席党的一大,那肯定在济南有党的组织。1921年10月13日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汇报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会议的12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50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强调“自称为”、“自命为”,是认为这些代表并不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王明1936年写的《英勇奋斗的15年》中也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计13人。大会代表不全系共产主义者。”有的学者认为,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从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在济南组建党组织的。一大之前,陈独秀曾与山东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王乐平联系,委托他在山东建党。但王乐平不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他没有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派了当时比较年轻、思想比较活跃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去参加一大。第二年王乐平曾率山东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被遗漏的天津、南京、香港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中共“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中,除上海、北京、汉口、广州之外,还有天津、南京和香港。但是,在过去的史书中,都没有提到一大之前这三个地方有党的早期组织。现将张太雷报告中关于这三地党组织的情况摘录如下: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1)拥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拥有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3)拥有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在这个地区,现在我们党正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

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他们周围,我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

南京组织,它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论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都会羡慕我们党。

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30个工会组织中的12个工会组织,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城市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大概由于天津、南京、香港三地没有代表参加党的一大,因而没有把这三地党的早期组织写入党史中。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是不是他们就不是党的创始人呢?被派到中国指导和协助建党工作的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汇报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建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他在1920年8月17日的汇报信中说:“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的报告说: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份文件还说:1920年7月4日,维经斯基及其助手来到北京,此前上海、天津等地组织的代表已到北京。7月5日到7日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上述文件中都提到天津和南京。1920年马骏与周恩来在天津从事建党建团工作,李大钊还参加过觉悟社的会议,11月周恩来赴法后,马骏继续在天津工作,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关于1920年天津早期党组织的情况,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其它地方采取统一的标准进

行评价。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

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保存的文件看,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即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俞秀松等)写的报告中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时成立的。”青年团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22日。1930年邓中夏发表了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一句话就是“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但是,在陈独秀被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后,共产国际的说法就改变了。王明1934年11月在苏联写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共的成立作为1921年。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写的《中国共产党15周年纪念》也是这样。但没有举行什么纪念活动。1941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活动。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准备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他接着说:“苏联共

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写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活动,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正式将党的一大之前各地的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各种党史均按照这种写法,直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再版时将共产主义小组改为党的早期组织。虽然现在不需要把沿用了60多年的“七一”党的成立纪念日再做变更,但对于党的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党组织已经成立的事实,应该做出客观的评述。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8040039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2008050153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 杜 光

2008年是改革开放启动30周年,社会各界涌动着回顾反思改革的热潮,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探讨改革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的文章。许多文章都接触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三十年改革的最大不足,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却没有随之以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当前社会的不够和谐不够稳定。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了腐败丛生、道德滑坡、贫富悬殊。

此文要探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成长与治理改进”,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把阻碍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改革成为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建设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有三:第一,是符合于公民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不一定就是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首先应该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意识到实现个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其次,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不太困难,因为我国的宪法已经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只要查看宪法就知道了。但是,要具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并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公民却不是很多。自从1954年颁布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54年过

去了,宪法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有多少得到实现呢?只能说是很少很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到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和侵害,而且摧毁了人们行使和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勇气。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仍然层出不穷。连续五十多年专制政治的高压统制,这就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公民权利的疏离。合格公民不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专制、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阻挡不了公民社会的孕育。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基本上都是公民因自己权利遭到侵夺而起而起来抗争的反映。风起云涌的维权抗争,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运动的发展超出了每个事件的个别性和孤立状态,而呈现出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特别是一些熟悉法律的律师,勇敢地站到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不但以自己的奉献牺牲精神,为维权公民做出了榜样,而且把运动引导到合法、合理、合情的轨道上来。维权运动的实践,正在培养着大量公民的公民意识,增强着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主要构件,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大学校,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它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不但可以成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还可以充当在公民和国家机器之间沟通意志的桥梁,承担许多政府机构力所不及的社会任务,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去年四川地震,许多社会团体踊跃投入救灾活

动,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明智的执政者懂得,要使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就必须欢迎、鼓励并且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相信他们的智慧和能量,让他们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遗憾的是,我国的当政者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他们往往从旧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出发,常常把社会团体视为异己的力量,或者是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之成为称心如意的驯服工具;或者是采取排斥态度,千方百计地防止他们出现;对于已经成立的社会团体,则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他们的活动。据2004年的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当时有13万多个社会团体,其中大量是半官方机构。例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会、妇联、青联、文联、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号称群众组织,本应成为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公民的各种权利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但是,由于他们的经费由政府供应,干部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选派,活动也由党组织控制,因而不能不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丧失了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准官方的政治工具,改革成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为此,有必要认真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实行“四自”原则,那就是:1、章程自定;2、经费自筹;3、干部自选;4、活动自主。只有实现了这“四自”,摆脱对国家权力的完全依赖和完全控制,这些社会团体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真正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

还有一些社会团体,由于成立时主要是由有关业务部门主导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在多年的运作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逐步争取官方的同意或默认,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企业界的行业协会和律师界的律师协会。这是两个基础雄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由于他们代表着企业家和律师这两个重要的精英群体,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开始就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并且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支持下成立起来,但毫无例外都受到官方的直接间接的控制。这是精英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无时不在为实现社团的独立自主而努力。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这几年许

多地方的行业协会和律师协会在这方面都有所前进。例如,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12月28日颁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将在行业协会任职的110名公职人员撤出行业协会,协会建立独立的财务账号,实现协会人、财、物的独立。接着,2005年6月又发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规范了行业协会的机构、职能和活动原则,保证行业协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律师协会的情况也可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律师协会在2003年7月采取律师直选、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了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当选的理事和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全部都是执业律师,这就为律师协会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当然,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各地律师协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据网上报道,宁夏律师协会在2007年12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由39名当选理事在13名候选人中选出11名常务理事。但因选举结果不符合领导意图,主席团竟强令各代表团“做好工作”,重新投票,选出合于领导意图的人选。像这样在专制下产生领导结构的律师协会,很难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这些情况表明,社会团体要走出官方的绝对领导,独立自主地发挥积极作用,还要走一大段非常艰难的道路。

目前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多数是没有登记,或者虽有名义上的挂靠单位,但实际上未受约束,自行其是。包括大量的民间研究机构、绿色环保组织、义工小组、兴趣小组、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支农组织、基金会等等。这些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最活跃、最有希望的细胞。他们很多并没有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因为进行登记很难被批准,还是先活动起来再说。这样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被人抓住,就成为“非法组织”了。然而,它们是按照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起来的,并无违法之处;真正违法的是那个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所以,那些社会团体即使被认为是“非法组织”,只要自己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它只是行使了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对于当局一些部门的查禁,也不必太在

意,“东方不亮西方亮”,禁止了一个社团,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我们目前应当做的,一方面是要呼吁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删除不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条文;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构建公民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台。到了大多数公民都能成为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逐渐成熟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体制的缺陷。目前遍布全国的群发性事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农会,在遇到土地被侵占、苛捐杂费、敲诈勒索、侵吞支农款项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就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使事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避免出现暴力行为。有了农会,农民之间的许多纠纷,也可以由农会出面调解,把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联结党政机关和农民大众的最佳渠道,是消弭官农矛盾和农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工具。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农会。所以,建立农会,应该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成完整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主要构件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这三条标准里,第一条说的是基本条件,第二、三两条是指应有的言行和品格。概括起来说,就是敢于以言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个条件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改革开放的策士,有的是维权运动的先锋,有的是与暴政抗争的战士,有的是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幕的猛将,有的是理性地探讨社会发展前途、构建独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智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承担着维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精英。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往往背

离传统观念和当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多数为当局所不容,有的还遭到监视、跟踪、绑架、殴打、拘捕。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公共知识分子队伍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许多知识分子迫于专制而噤声不语,洁身自好,或以钻研业务自娱,或以颐养天年自慰;有的热中于争名夺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假、作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追随权势,唯权唯上,甘愿为虎作伥,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打手。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分野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直接后果。人们通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当许多知识分子的良心被名力和权势吞没时,他们怎么能够充当社会的良心呢?过去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后来又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我看现在还应该加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地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们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素养的公民,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知识、文化和学术才能反馈给社会,奉献给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需要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热烈地期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来思考问题,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积极投入到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队伍中来,共同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历史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辜负他们。

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更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再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还缺乏民主和新闻出版还缺乏自由,我们才应该更加努力去改革社会体制,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以此促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社会是紧密结合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我们绝不放弃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帮助广大公民增进公民意识,加强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

任感;发展民间的社会团体,促使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民间化,呼吁、发动知识分子关心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公共知识分子队伍。公民社会的这三个构件也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构件上做出努力,都可以促进另两个构件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互联网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公共知识分子施展

才智、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个条件是十年前二十年所没有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有了互联网的新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投入建设公民社会的伟大工程。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为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公民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杜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国史札记	林蕴辉	40.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28.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陈大斌	38.00	7.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28.0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 胜	45.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马寅初全传	彭 华	35.00	7.00
1958—1962 年的中国知识界	罗平汉	32.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 21 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夹边沟记事》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讲述了大饥荒中发生的故事。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何处。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1949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显现在读者面前。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见证一代伟大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高贵、执着的沧桑人生。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将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重新定义公有制

● 徐建

纵观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每次改革开放的高潮到来之前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九十年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社”与“资”的争论;如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公”与“私”的争论。因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公”与“私”的矛盾日显突出,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有人担心私有制的发展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私有经济扩张造成公有资产的萎缩。有人虽然承认私有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又不愿赋予其应有的名分和平等的地位,因此《宪法》在对我国现阶段公有制性质的表述上,用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实践证明,“非公经济”这一概念非常值得商榷。

一、不利于划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范围

从逻辑学的角度,内涵要十分清楚,外延才能界定。所谓公有制,其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认识模糊混乱。传统理论一般是将国有、集体所有列入公有制范围,但何为国有则说法不一,有人说,县级以上政府开办的企业就为国有企业,乡镇政府开办的就不属国有;有人认为:国有资本占绝对控股的就是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占相对控股权就算国有企业。至于何为集体企业,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集体与团体、集体与合伙在现实中实在难以区别,实践中,集体企业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公有制经济的内涵无法科学界定,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外延范围就无法划分。然而,这种划分界定在

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又是必须的,因为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直接决定其社会法律地位以及政府所给予的不同政策支持和优惠。

二、不利于调动非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

将我国所有制分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本意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辅助,共同组成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但在客观上,容易形成公有制企业高人一等,享有特权和优惠,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寄人篱下,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政府监管等方面,都无法与公有制企业同日而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政府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出台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此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对非公有企业的偏见,严重挫伤非公有制企业所有人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该《意见》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其原因之一就是《意见》本身就没有何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定论,也就无从谈起何人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了。

三、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划分不同的所有制,归根结底是政府根据其不同的施政纲领、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现代社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营造让各行各业进行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除国防外交和公共利益需要外,政府一般不应经营企业,法律也不应根据企业所有制即股东身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保护。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这是

普世价值观。这里的“人”，既指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无论是决定财产权利的民法，还是剥夺人身权利的刑法，都应当如此。然而，目前法律却区分所有制的不同，给予明显不同的保护。如同样一个人，非法取得同样一笔财产，如果被害单位是公有制企业，则定为贪污罪，最高刑为死刑；如果被害单位是非公有制企业，则定为侵占财产罪，最高刑只有十五年。这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显然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笔者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标准取决于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主体范围。令许多社会经济学家深感费解的我国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流传的俗语：“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此语简洁质朴地道出了所有制的本质形式。

所谓“一人为私”，是指个人是所有制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属于私有制性质。

所谓“二人为公”，是指两个人以上的主体间通过合作、合并、联合、联营等形式，对物实行的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统称为公有制。如夫妻二人对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公司股东按股份比例对公司权益的按份共有；国有资产为全社会所共有，或区分所有（如物权法中所有权与他物权之分）等等。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是规定保护私有制而不是保护公有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私有制的范围讲的清楚且是所有制的基础。由私有制的组合、联合、并购演变出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所有制，如中央、省、市、机关、团体、单位、公司等的所有制，如果要统一称呼都应为公有制。由此可见，所谓公有制，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组合格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与私有制无关的所有制。

一个人的财产，自己说了算；两个人的财产，如何使用，必须商量着办。照上，更多人的财产，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要求

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对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提出

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要求

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

如何使用也只能共同协商，这实际上就是民主。由此可见，公有财产与经济民主天然相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民主也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样划分所有制的好处是：

1、正确划分不同所有制的范围。由于作为私人的个体对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易于划分，如个人的存款、房屋、汽车等私有制的内涵十分清楚，除了私有制以外全是公有制，因此，作为外延的公有制也就容易界定划分了。

2、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部分都应属公有制范畴。除了个体户和独自公司以外，只要两个人以上拥有的公司企业、团体组织，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不管乡镇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都属于公有制的范畴，应享受同等的政策优惠和法律保护，从而使人们从理论上和观念上彻底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以及对所谓公有资产流失的恐惧。

3、扩大了公有制的范围，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一个人类大同、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实践的步骤应该是逐渐的扩大公有制范围，最后消灭私有制，而不是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缩小公有制经济。

因此，现阶段，倡导“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理念，将非公有制经济中除私有制以外的部分，全部纳入公有制的范围，重塑公有制界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应该是思想解放的前哨，深圳不仅要出经济、政治改革成果，也要出思想解放成果。对“公”与“私”重新认识和界定，或许由此引发的大讨论，可能成为第三次改革开放浪潮中思想解放先行的又一个标志。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吴思）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思 源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往今来,人生在世,常见的风险莫过于遭灾之年,无米下锅、食不果腹。古时候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却早有慈善事业,如施粥之举。饥民早起排队,一人一勺、一勺一大碗。施粥因承办者不同而分为三种:一是王府官家施粥,二是富裕人家施粥,三是寺庙出家人施粥。其宗教慈善事业流传甚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近现代广大工薪阶层最常见的风险则是,天灾人祸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减少或失去工资收入,因而需要相应的救济办法。最先是英国1536年颁布公共救济计划法令,让教会承担救济贫民的义务;1601年、1834年又先后颁布了两部济贫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系统化、规范化。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概念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尔后陆续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各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社会保障概念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力、失业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经济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提升而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迄今为止,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着不同具体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保体制难以为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中国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亿万公民对于社会保障的需求十分迫

切。根据零点研究咨询公司2007年初的抽样调查:50.2%城乡居民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24.8%的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和其他社保这四类社会保障中只享受到其中一种,而被纳入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人员,只占全国人口的1%。该公司的民意测验表明:社会保障问题在2006年公众关注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排名第一。(《看世界》杂志2007年3月号)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考量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 社会保险。主要包括:1.养老保险;2.失业保险;3.医疗保险;4.工伤保险;5.生育保险。

(二) 社会救助。主要包括:1.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户救助;2.灾民救助;3.流动乞讨人员救助。

(三) 社会福利。主要包括:1.孤寡老人福利;2.孤儿、弃婴福利;3.残疾人福利。

(四) 慈善事业。按慈善事业的组织单位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类:1.宗教慈善事业;2.世俗慈善事业。

以上社会保障基本框架的划分,有约定俗成的含义。某些众所周知的问题,譬如住房问题,就没有包括进去。而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已被人们喻为新的“三座大山”。显然,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对于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在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涵盖之中。

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各个部分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影响、关联互动,综合作用。例如,

失业保险就不仅仅是救济失业者,它还有利于促进就业、促进劳动力流动并减轻社保基金支付压力。

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失业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失业救济的概念。1986年制定第一部企业破产法时,我们的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主动承担了同时起草失业救济法规的任务,并在同一年获得通过,顺手实现了失业保险制度零的突破。失业保险制度在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劳动者有从A企业向B企业流动的权利,承认了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有接受新的职业培训,获得更多谋生手段,从而拓宽自己就业门路的权利,劳动者就业门路宽了,相对而言,失业者也就少了。因此,需要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也就有减少的趋势,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也就能相对舒缓了。这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与促进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失业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之间关系也很密切,但是二者并不能互相替代。现在有人主张将它们“并轨”,实在是不了解其机制所致。

失业保险是为劳动者在两次就业的间歇期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个保障期比较短(国外大多限于1年,中国《失业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为“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而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低保”)是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俗称贫困线)的救助保障。这个保障期与失业保障期不一样,有时甚至会相差很大。

此外,这两种救济金数额也不一样,失业保险金往往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后,符合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截至2006年底,全国城镇失业保险覆盖人数已达1.1亿以上,而“低保”覆盖人数,在城镇还只有2241万人,农村才1509万人,覆盖面相差悬殊。

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作用是济贫,而失业保障制度的作用是促进再就业。二者宗旨不同,不可混淆。如果强行“并轨”,

恐怕就要“出轨”了。

二、老龄中国的社保难题与对策

按照联合国定义的标准,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7%,就标志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这一指标在1999年为7.6%,2006年已达9.2%;大城市如上海,2000年便高达11.5%,早已跑步进入老龄社会了。(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卷第102页,2007年卷第115页)

像个人的老化一样,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也是不可逆转的,只能愈来愈老矣!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老人将达到4亿。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中国1999年人均GDP才6534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价,只有789美元,2006年人均GDP也才16084元人民币,合2018美元。可以说,欧美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难题。(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卷第53页,2007年卷第57页)

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1990年为5.38:1,2006年已降为2.98:1。(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卷第902页)

也就是说,16年前是5个多人养1个人,如今不到3个人就要养1个人。照此速度,2:1指日可待。到时候,每2位上班者就要养1位退休者,能养得起吗?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到2004年年底,全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还在以1000亿元的规模继续扩大。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养老机构将没有足够的钱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有人主张把目光重新转向家庭成员互保机制和传统道德,不过资源毕竟有限。一胎化政策造就的“1-2-4部队”遍布全国许多家庭,一个孩子要承担两个父母和四个祖辈老人的养老,谈何容易!

一颗定时炸弹正在嘀嗒作响,老龄化中国的社保面临着养老基金严重不足。一旦老百姓领不到养老金,并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崩溃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抢在崩溃发生之前,找到增加养老基金的对策。

为此,我主张将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先拿出一半来,划拨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以应急需。

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为5.7万亿元,将其大致一半,即2.9万亿元划归社保基金,一部分用以偿还老职工的社保欠账,另一部分充作社保基金的战略储备。面对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这才可以喘口气。

现在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没有法律障碍?我的回答是:没有障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同理,国有资产,亦即全民所有制财产,将它从国有工业企业划拨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纯属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划拨,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何况,国有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劳动者创造的。我国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低工资,职工工资远远低于正常工资水平(从经济学上说,即必要劳动),其差额也被作为利润上缴国库,转为国家投资,形成国有资产。这部分国有资产实质上也就是企业职工必要劳动的结晶,它无疑属于企业职工。如今将这部分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参保职工所用,也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合法,同时也合情合理。

以劳动者自己往年的公共积累,用做“善款”,为劳动者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无疑是一项德政。这样一件大好事,请问谁反对?至于从国有企业划拨来的国有资产在并入社会保障基金之后,应如何管理?这是后话,当另行研究。

三、农村社保,遍地是金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二者差别甚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悬殊

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为16353万人,占有职工的100%;有2205万城镇居民领取最低生活补贴。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只有5382万人,领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补贴的农民为488万人,城镇居民的参保率是30%,农村居民的参保率是

7%。

(二)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标准高于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难救济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政府免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这两项保障。除此之外,社会保障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缴纳的保险费越多,意味着未来的保障水平越高。目前,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均保费分别是3476元和920元,而农村试点地区居民的这两项保费是66元和30-50元(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标准原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个人各出10元,后改为中央、地方和农民个人各出20元、20元和10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是农村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的52.5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缴费额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缴费额的18-31倍。

2004年城镇离退休职工人均领取养老金为9270元,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均领取的养老金仅为492元,前者是后者的18.8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保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标准不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不可能保证老年农民达到农民平均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参保农民的保障程度只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多年来,有不少人从社会公平出发,怀着对农民深厚的兄弟情谊大声疾呼,要求加快农村社保进展,缩小城乡社保差距,但收效甚微。要问原因何在,人们说,原因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保没钱。果真没钱吗?非也!在我看来,农村社保,遍地是金。这地,就是农民的土地。

几千年来,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农民的最大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这个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经通过土地改革而实现了。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取得执政权,说到底还不就是向亿万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嘛!因此,谁否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人不是糊涂忘本,就是别有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获得和享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存在和发

展的合法性基础。没有这个合法性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基就不稳。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公然宣布否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集体化等等历次运动改变的只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自从手握土地证之后,他的土地所有权就是天经地义、无可否认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一样。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农民的土地就是农民的!既然如此,农民动用自己的部分土地为自己办理社会保障,完全合理合法。同样道理,集体化的农民动用一部分集体化的土地为农民集体办理社会保障又有何不可呢?不许农民用土地办社保,实际就是迫使农民长期陷于“端着金饭碗讨饭”的尴尬处境。

只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承认农民有权动用部分集体土地办社会保障,那么,我们说“农村社保,遍地是金”一点也不过分。

千里冰封,从何处打开突破口呢?天津“以宅基地换房”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据2007年4月17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用“以宅基地换房”的方式建设新型小城镇,取得显著效果。2006年,天津已开工的农民住宅和公建配套设施达180多万平方米,2008年上半年,部分农民已开始分批迁入新居。天津市这一做法不仅对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有益,对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有利,而且对于开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局面,很有借鉴意义。

所谓“以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就是农民以其宅基地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占地与补地平衡”。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出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相当的收入。这一做法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约土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改变生态环境,能够为城乡管理制度创新提供契机,而且对于建立农村社保的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能拓宽思路。

就节约土地而言,天津市的5个试点区,涉及37个村2.1万户6.6万人,这些试点村镇共有村庄建设用地2.13万亩,建设新的小城镇和中心村需占地1.56万亩,在实现耕地总量“占补平

衡”的前提下,可腾出土地约5700亩,平均每户节省出来0.27亩。如果能够在全国推广天津市的这一做法,那么,目前全国共约2.4亿农户,即可节省出6480万亩土地。

最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建设用地的价格在不断攀升,从中国土地挂牌网看,各地土地出让金每亩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即使在许多县城也已达几十万元。即使以每亩75万元计,6480万亩也可卖到48.6万亿元。这48.6万亿元若分配到全国2.4亿农户家中,平均每户可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将超过20万元。按2006年农村7.3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户三口人,农民的三口之家能将这2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半用于建新住宅,另一半用于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应该是绰绰有余,教人喜笑颜开的。

这套方案中的关键每亩75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格,是有现实根据,并留有余地的。因为最迫切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并不是土地出让金价格在每亩几十万元的地方,而是每亩500万、1000万元的城市!如果“以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的模式得以推广,就应该是价格最高、最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为了获得耕地总量“占补平衡”的指标,到较少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来置换农民的土地。因此,农民所能得到的土地出让金会更高。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价格还有继续上扬的趋势。这对于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兄弟解决社保经费等问题是一个利好的前景。

在保证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的条件下,以农民的宅基地集约化节省出来的土地,置换城市急需的建设用地,从而使农民兄弟获得建立社保制度所需要的资金,这只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条条大路中的一条。思路拓开了,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行方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四、开放宗教慈善事业

(一)宗教慈善 源远流长

宗教慈善事业是人类慈善事业的源头和主干,神州大地也是如此。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中国,时值中国西汉后期。佛教教义

中蕴含的慈悲观念,与古代中国本土的仁义思想相结合,经一些高僧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颇有道德约束力的中国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在这种善恶有报的佛家说教的影响下,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害怕来世投胎为畜生受苦受难,因而心生警觉,去恶从善,多行布施。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浮屠寺庙遍布大江南北,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随之兴盛起来,范围涉及济贫赈灾、施医给药等诸多方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悲田院,始建于北魏,至唐朝武则天长安年间,在官方支持下,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慈善组织,影响深远。到宋朝改称“福田院”继续发展。名称虽有不同,但性质都是佛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养老院、孤儿院、养病院,同时兼救灾、济贫、收容难民等等。至明清时代,各地许多慈善会、慈善堂多创设于寺庙,由僧人管理;也有的由那些信佛的“张善人”、“李善人”出面筹资创建,都反映了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密切关系。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是传播教义、践行佛法、引导信徒、树立佛教形象的主要方式。事实上,没有比济人之急更为便捷的方式来让世人认识、理解和信仰佛教。

道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东汉中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奉春秋时期的老子为教主,尊其著作《老子》(亦称《道德经》)为经典。

道教的理想境界是长生不老做神仙,而其前提条件是积德行善。因此道教倡导“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为此,道教出了很多劝善之书。其中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著名善书是宋代出现的《太上感应篇》。为之作序、作注、作图的文人墨客甚多,故而在中国流传数百年,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之一。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后来迅速传播于欧洲、北非乃至全世界。在历史上形成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一些较小的流派,它们信仰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基督教于唐初、元初和明末清初三度传入中国,历时长达1300多年,与此同时也就把基督教慈善事业传进了中国。广泛传播福音、开设教堂、吸纳信众和开办慈善事业成为基督教在中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慈善事业成为塑造基督仁爱形象和实

践基督博爱美德的重要途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医疗、育婴、救济等各项慈善事业在中国各地有更加深入的发展。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死亡上千万人。李提摩太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赈灾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还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育婴堂、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到1937年止,美英在华设立的基督教教会医院共计300多所,病床21000多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多处。基督教慈善事业当时不仅获得中国社会舆论的好评,而且带动了民间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的改进与发展。

(二)宗教慈善,不可或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宣告旧的慈善福利救济事业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完全否认了民间慈善事业(包括宗教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而将政府视为全部慈善救济事业的主体。尔后政府对民间(包括宗教)慈善机构进行了改组和接收,对于接受外国(主要是美国)援助捐赠的慈善救济团体全部接收,财产一律充公,外国教会在华兴办的学校、医院也被接收和整顿。至1953年底,全国各地原有的慈善机构419个、救济福利团体1600多个,均被改造成为附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中国大陆便已不再存在现代民间的宗教和非宗教慈善机构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民间慈善事业被迫休眠了三十余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中国宗教领域和慈善领域各自都有了复苏与复兴的机会,并且有了许多可喜的成效。但是,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地带,即宗教慈善事业,却是阳光姗姗来迟,势头不如人意。这方面的

人均慈善捐款对比表

2005年

	美国 ^①	中国 ^②	中美差距 (①÷②)
慈善捐款总额	2602.8亿美元	61.8935亿元人民币(合7.5556亿美元)	344.5倍
人均慈善捐款	878.1美元	4.7335元(合0.5778美元)	1519.7倍
扣除人均GDP 差距之后的 人均慈善捐款 (878.1美元÷24.6)	35.7美元	0.5778美元	61.8倍
国内生产总值	124857亿美元	183085亿元(合22350亿美元)	5.6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2123美元	14040元(合1714美元)	24.6倍
人口总数(亿人)	2.9641	13.0756	

参考文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卷第57、734、1025页,2007年卷第1019页;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06年卷第284页;2006年10月20日《报刊文摘》。

缺憾,似乎不那么惹人注目,但是细加考察,它却造成了我国近三十年慈善事业与境外慈善事业的巨大差距。

请看中美两国人均慈善捐款比较(见表)

上表告诉我们:2005年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61.9亿元人民币,折合人均0.5778美元,只及美国人均慈善捐款的1/1520。考虑到中美经济实力(人均GDP)相差24.6倍,可以扣除这一因素,将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除以24.6,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均慈善捐款仍然近36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慈善捐款超出60倍。差距惊人!

中美两国人均慈善捐款的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何在?就在于宗教慈善事业的到位与缺位。据1996年统计资料(刘澎:《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美国有各种宗教机构35万个,这个数字仅占美国所有非营利机构的20%,但其获得的捐款占全部慈善捐款总额的比重却高达60%。这就是宗教慈善机构的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

在美国宗教慈善机构中,参与贫困救济与家庭援助的占92%,从事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占90%,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占74%,维护民权的占62%,提供海外救助的占60%。这些社会慈善服务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以至于美国人自愿奉献的慈善捐款远远超过美国政府征收的全部企业所得税(1914亿美元)。(《国际统计年鉴》2005年卷第175页)

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关系复杂、各种利益严重对立、社会问题充斥的国家里,宗教慈善组织依靠不断增殖的社会资本,站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弥合社会矛盾的最前列,发挥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然而宗教慈善事业却迟迟没有恢复它应有的地位。2005年11月公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2006—2010)》中,宗教慈善事业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区,实在令人费解。在古今中外都曾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宗教慈善事业,对于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缺了宗教慈善事业,犹如一架飞机缺一叶机翼,能起飞吗?

(三)宗教慈善,促进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是在重新确立了自身合法性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重新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宗教慈善事业的合法性不言而喻。恢复和发展宗教慈善事业,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无疑也同样保护宗教慈善事业。在这些大前提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宗教慈善事业这块田地为何还满目荒凉呢?据我研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宗教机构进取精神不足。

中国各地的寺庙、教堂门口大都有捐款箱,名曰“奉献箱”或“功德箱”,只等施主上门,来者随意捐款若干,教徒较少有组织地从事募捐和救济贫困,更未见有恢复和发展宗教慈善机构的宏图。

另一方面是社会认识有偏颇,思想还须更解放。
(下转37页)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

● 王克明

冯友兰先生在1988年初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1990年去世前5个月,以95岁高龄完成。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后来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完成这册书后所写的《自序》中,他讲到文革后老妻去世时他写的挽联中,有“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之句。他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四十年,达数百卷,几百年以后才出版。冯友兰为什么要自比王夫之?为什么说真感觉到了自由?因为在最后的著作里,他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独立的认识和分析。谨摘录介绍如下。

毛泽东思想分科学、空想、荒谬三个阶段

冯友兰在书里这样介绍毛泽东:“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二、社会主义阶段;三、极左思想阶段。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解放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纲领,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与各民主党派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其经济制度中,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称为

新民主主义经济。冯友兰认为这个纲领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法律形式。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措施。”

5年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代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冯友兰回顾说:“《共同纲领》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宪法》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宪法》的公布,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示毛泽东对于革命方法的认识的大转变……这个转变,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深远的后果。”冯友兰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阶段,到此为止。

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大转变?冯友兰认为,建国后,应该做的事,就是调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各种方式,由各种渠道,齐头并进。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果五种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束缚,那就用社会主义再作解放,这就是革命分两步走的道理。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有‘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曾几何时,毛泽东也走上了‘左倾空谈主义’的路了。”



冯友兰(左)与毛泽东

那时,毛泽东批判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人们,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右倾的错误。冯友兰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这句话,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冯友兰认为毛泽东思想由此进入了空想的阶段。

他写道:“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

人民公社像一个封建大家庭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农村中。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共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物。几年之后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连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组织起来,称为合作化。这种组织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冯友兰说:“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

他分析道:“可注意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共产

主义’的内容,实际上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类的思想。其类似之处,在于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列举了五种社会类型,一层比一层高。每一新出现的类型,都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

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冯友兰又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员准备了‘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

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总是以其经验为资料的。以旧的资料配上新的名称,这可叫做“新瓶装旧酒”,人民公社便是。

无产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的极左思想,表现的高潮为“文化大革命”。冯友兰认为它这一阶段是荒谬的,其荒谬之处在于空想共产主义。

冯友兰说,如果认为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社会生产力就会比以前高几千倍,那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因为它的立足点是人们的愿望。在刮‘共产

风”的时候,认为只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粮食的亩产就会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斤,便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就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统治了中国,造成了十年动乱。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分。他引马克思的理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他写道:“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那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呢?冯友兰说:“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的原则并没有被贯穿到底。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却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人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由此看来,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进行革命,不能夺得政权。而是说,不能不顾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前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政权,其革命的任务也应该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因此,其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靠空想办事情。”

冯友兰认为,空想的东西,是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的。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所以要改革。他说:“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内容的,不过它的内容是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取来的,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出现。”“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人类不会永远“仇必仇到底”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最后,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比较,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他先做了一点理论的通俗解释:“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

然后他说:“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

怎样重大的意义呢?他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冯友兰的这个推测,让人想起在和平年代分裂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干脆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些正是“仇必仇到底”的行为逻辑。

冯友兰问:“‘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毛泽东思想也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毛泽东常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什么叫‘到底’?‘底’在哪里?”

他自己答道:“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

就‘到底’了。”冯友兰认为没有这种必要：“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的转弯。”

怎样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汉字“和”，国内观众也看到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统一思想、老百姓啥都忍着就和谐了的意思。二十年前，冯友兰已经对这个字做出了哲学解释。他说：“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

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只要求“同”，不能容“异”，就只会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极权制度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有民主、监督、言论自由之“异”，才有真“和”可言。

冯友兰放眼人类，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人类实现和解，是哲学老人冯友兰最后表达的心愿。

（责任编辑 吴 思）

（上接 33 页）许多人都看到，每一次赈灾救困活动中，各个宗教组织都表现得相当踊跃，做出了重大贡献，宗教慈善是社会慈善的重要补充和积极力量。但是，某些宗教管理部门在鼓励、支持宗教界搞慈善事业的同时，还坚持要求“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管理，使宗教界人士开展的慈善活动，从‘宗教慈善’向‘社会慈善’发展”。（吴玉祥《积极支持和引导宗教界发展慈善事业》，中国宗教网 2007.1.24）

为什么一定要让宗教慈善变成“社会慈善”或曰非宗教的慈善？这种主张，犹如经济改革初期某些领导机关主张对私有经济要“利用、限制、改造”一般。殊不知，宗教慈善与私有经济一样，未来的寿命都是很长很长的，它们都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二等公民。

人们不禁联想到，中国工业有过一个 U 形发展轨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中，私有经济比重占 70% 以上，它后来被当作异己力量遭到打压，比重几乎降为零；经过改革开放，如今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比重重新占据 70% 以上。试问：如果没有这占据 70% 以上的非国有经济，能有今日中国经济的繁荣，能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吗？

2007 年 2 月 7 日英文版《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信仰者三倍于估计》的文章，披露

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和刘仲宇教授领导的一项耗时整整三年的大型调查，发现 16 岁以上的中国人中有 31.4%，也就是 3 亿人是信教的。其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五种主要宗教，占据信仰者 67.4%。此外，在调查中，不信教的、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总人数的 15%。

显然，宗教和宗教慈善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 3 亿信教的公民中，宗教慈善事业的潜力是很大的。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一旦重新开放宗教慈善事业，恢复其应有地位，它不仅对中国慈善事业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对整个中国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感 谢

2008 年贵刊第 11 期刊登北京读者弘民同志来信，申明我“没有去过坦克六师”。对于编造我“去过坦克六师”的谣传，而且是一个长期反复传播的谣传，给予了更正与澄清，伸强了正义与公正。

我谨向您们，北京读者弘民同志《炎黄春秋》的领导与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深切的感谢！

张秋桥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

●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知识广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剧。阿甲在《打渔

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〇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人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用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比得上



毛泽东与康生在延安

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〇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

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

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

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

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

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青人，竟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

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〇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

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为什么,党内谁敢表现?诗,你能超过神?你写得比神好,没有人敢的,不敢发表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做诗,你做诗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曾彦修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大 学 者 束 星 北

● 方 朔

李政道向周总理推荐的老师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就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1931年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他在向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二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最初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



从此对他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老师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老师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名著。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

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爱因斯坦、玻尔大师的身边

一生只是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有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的天才。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在任职的海洋研究所手中的一台计算机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上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

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他当面责难蒋介石 国难当头 投身报国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

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

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

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

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竟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

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流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读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

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n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

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我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

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竟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董第周等文化

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詎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晨)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

● 郭小林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一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

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是肯定的，对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现正等待体委党的核心组讨论。如同意写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儿信又说：“今天上午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了会，讨论了那篇文章，认为‘很好’，四月号发表，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庄也要我帮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严阵的信中说：“历时四个月之久写的一篇通讯，三月卅日才经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通过，将在《新体育》四月号上发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话），真是难产。我仍有些担心，是否还有什么错误？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见《郭小川全集》卷7第586—596页）

而字数比《笨鸟先飞》多了一倍的《小将们在挑战》，采访和写作时间一共仅用数周时间，对比之下，足见这次创作态度之谨慎。



1959年参加国庆活动时的郭小川

文章写出后，王猛等人多次审阅，并召集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郭按照领导意图修改后（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对“天才论”的话），1973年4月发表于复刊后的《新体育》第4期。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用真名公开发表作品，算起来已有8年未在报刊上露面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坛激起很大反响。许多朋友写信给郭小川表示祝贺，有的甚至说：“此间盛传您要出任体育报社社长……”

香港《文汇报》也很快转载了全文，并加“编者按”，题

目为“久违了，郭小川”，还出版了小册子。

与此同时，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庄则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为题作讲演，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先后到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和上海。他邀请郭小川同行，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听众介绍坐在台上最外侧的郭小川，说“这是我的老师郭小川……”

文章无端惹祸，江青另有用意

这些情况早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汇报上去，江青得报后发话：“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又窜到体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来打压“不听话”的王猛，而打击王猛，更深层更隐蔽的目标则是周恩来。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问题”就可以打击王猛，那么不管文章写得好与坏，在江青那里一切已经决定了。就这样，郭小川不幸又成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关于《笨鸟先飞》，据说江青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是原作协干部、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的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告诉我的，他说：江青

看了《笨鸟先飞》，斥责道：“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千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

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

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

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撻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

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

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

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 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

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特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荃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荃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新闻考

● 靖 鸣 周燕琳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

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1]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2]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莨高产试验。^[3]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入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莨，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4]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5]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多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月9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6000多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点24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到没过秤的队伍中再一次过秤,即所谓“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晚上9点30分才收割结束,留下0.055亩稻谷未收,供参观。^[6]然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某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18.9亩(包括这块田,实际上并莨60多亩地),并莨移栽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就这样,全自治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

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7]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事实上,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3.3亿斤,实际产量却只有1.05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1959年全县共死亡22685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8]“十三万斤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媒体报道“十三万斤”的调查与考证

“十三万斤”的报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广西自



《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治区党委向中央、广西一些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然后在媒体的积极参与下出笼的。被邀请参加验收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等 16 家新闻媒体。

“十三万斤”验收活动仪式由电影摄影师叶宁具体担任验收总导演。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较早的策划新闻。

1、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事后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联版“套红”刊载放卫星消息，标题是“通栏”的，引题是：霹雳一声创古今中外奇迹 光芒四射看巨型“卫星”上天，主标题是：环江放出亩产十三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

消息由该报记者张之召报道。报道除了强调亩产数字，主要介绍了参加验收的领导班子、专家团，报道将卫星田从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会场的热闹和喜庆，并提及介绍经验的座谈会和报喜丰收大会。对卫星田出笼的过程简约带过。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块卫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过膝……所放肥料无法计算数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后，头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后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担人粪尿，用水稀释后洒施，包胎后还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过磷酸钙水。密植是一莛紧接一莛，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个僮族姑娘在上面如站平地。在管理上还抓好防虫防倒，每夜在田角点四盏油灯诱蛾杀虫，派了六个人，用三个鼓风机和人力拉挂扇在禾行间鼓风，扇风，降低气温。因此，这块田在收割时没有倒伏，穗长粒多，一般穗长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这块田的密度已无法计算，验收的同志十多人，在验收时坐站在禾苗上，都没有影响。”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罗列的数字相当多。看似精确，实则虚浮。

该报第一版配发两幅新闻照片（张之召摄）。一幅是四名妇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风机正在为这块试验稻田降温，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

的篇幅刊发该报的社论《祝贺专区第一颗水稻巨型“卫星”上天》。

第二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之召写的《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记红旗社培育水稻巨型卫星的经过》，因篇幅较长转发第三版。第二版也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的文字说明是“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卫星田，除了用鼓风机给根部吹风外，还用席子做好大风扇经常给它扇风。这是社员在拉风扇。”另一幅的说明是“各县到环江来参观的同志，都舍不得离开这颗中稻大卫星。”该报尾刊发了一位叫“唐云”的作者写的诗歌《放出卫星震全球》。

2、《广西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广西日报》老同志周汉晖在 1988 年 7 月《广西新闻史料》（2 辑第 11 页）发表的《“左”的实录——〈广西日报〉1958 年的农业宣传》一文中记叙：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把报社领导人和周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安排版面，当时还有玉林地委副书记等在座。书记将了他们一军：“环江放卫星了，你们呢，怎么办？”他们听了，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当晚午夜过后，第一书记又派他的秘书来到报社夜班室，问：“有没有重要时事挤占版面？”待看了清样，见一切按原来的安排，才放心回去。过了好几天，《人民日报》还未刊登，自治区党委某领导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催问。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豆腐块大的新闻。

来看当年的《广西日报》是如何报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环江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和红旗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压报名的通栏照片是水稻收割现场，头条通栏三行“套红”标题，主标题：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行副标题：红日公社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在这一标题下有两篇报道，占了半个版面，其中一篇报道了“亩产十三万斤”。《广西日报》在报道时相对《跃进日报》显得更加“详实”和“客观”，语气和用词都表现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内容上的详实：“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

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消息导语);在用语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经过严格验收与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纪录。”

这则消息交代了这亩中稻田高度密植的过程以及护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和不能充分吸收阳光而发黄,社员除了每天用竹竿拨开谷穗让太阳晒一二次外,还用四个鼓风机巡回四周日夜不断打风;太阳落后,又用人拉挂风风扇扇风,以通风降温;为了防止倒伏,社员们又用竹子在四周拦起,因而禾苗没有倒伏,颗粒肥壮饱满。”看似客观报道,却是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认为这样的卖力气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八月二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那十八亩田的禾苗移走以后,有一部分田随即用水直播的办法种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种上了红薯。移植时,为了实现高产计划,这块试验田又进行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经过后来史实的核实,这段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9月11日给“环江县委、人大常委会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

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300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958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50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

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伟大成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犯错误’，会受到处分”。^[9]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惟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10]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 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 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

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11]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12]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 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13]

庸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

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14]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

进,不折不扣地加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注释

[1]钟家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广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120页。

[2]同上,123-124页。

[3]环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38页。

[4]王定:《狂热及其灾难》,《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18版。

[5]、[6]同上。

[7]《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339页。

[8]《狂热及其灾难》。

[9]冯东书:《如果1958年有舆论监督》,《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28页。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25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518页。

[12]同上,26页

[13]同上,124页

[14]同上,27页。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责任编辑 李晨)

喜讯: 3000元出版个人文集!

出版说明: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都有出版个人或家族文集的习惯,但现在出版社内容审查严格且价格昂贵,谁能帮助广大民间作者低价快速出书呢?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专门设立《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为个人少量出书提供专业服务,三年来已为四百余位作者编辑出版了精美的个人文集与书刊画册,深受国内外作者的喜爱和好评。欢迎广大作者来电咨询或来编辑部做客!

出书范围:

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回忆录自传等纪实作品、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思想学术论著、旧书翻印等。

服务流程:

作者提出出书意向→公司计算成本价格→上门签约支付定金→协助整理完善稿件→电脑录入编排校对→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作者二审→设计封面插页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印刷出版送书。

联系电话: 010-68920114

传真: 010-68920182

邮箱: grcsw@163.com

涂主编: 13693651386

13521186881

毛编辑: 13901218759

冯编辑: 13718619470

个人出书网
精神长存



详情请登陆《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内 邮编:100089

“麻雀”有故事

● 雷 颐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焯、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

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察：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

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对北京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的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



成车的麻雀被作为战利品送上除四害展览会

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一天就“歼敌”25万。而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1997年9月30日《文汇报》)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

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

● 邢同义

1957年7月12日以后,甘肃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开始启动。

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8月8日以后全面推开的。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8月10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

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任何犹豫和抵制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第三、农村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挑战,通过农村整风运动再巩固提高。

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

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

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晨)

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你们忙啥呢,我现在老了,迟早要死,我死了也不能叫你们好活,总得把你们弄掉几个再死”,吓得合作社干部周茂仁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运动开始以后,这些人的行为也都受到了清算。

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订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

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1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

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

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鸣大放斗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

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1957年9月29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现有水地1500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1500万亩水地的目标在50年后仍然没有达到。2008年10月28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1400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责任编辑 李 晨）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

● 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至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

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

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做“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

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编辑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李晨）

广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水量达120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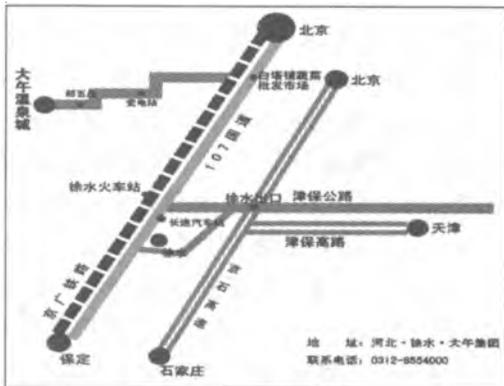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0312-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

● 郑青如

这里记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段时间内,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参加新闻战线斗争的一段真实的史实。

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当时我在淮南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大学担任英语教师,正随部队东进接管苏北敌占区,攻克了宝应、淮安、淮阴县城。9月25日,我正在淮阴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领导通知我要调回上海另外分配工作,立即出发。说实在的,我很不愿离开正在战斗的部队,可是军令如山,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脱下军装,穿上向老乡要来的一件枣红色旧旗袍,随同前来接应我的人一起离开淮阴,乘船从运河南下到瓜洲,过了封锁线,渡过长江到达镇江,搭上京沪列车,潜回上海。

那时,上海已被从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空运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疯狂接收,正忙着筹备庆祝十月十日国庆节。火车站、南京路、淮海路已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身穿大礼服的蒋介石半身像到处悬挂。马路上吉普车奔驰,酒楼、舞厅和酒吧内霓虹灯通明,播放着醉人音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为了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没有武装夺取上海。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认为大城市的宣传阵地决不能丢,决定派遣一批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从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进入上海,寻找机会掌握宣传阵地,其中任务之一便是积极准备出版一份党报,公开向收复区的广大读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奉命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我先到理发店烫了头发,换了一身像样的旗袍,然后到南京西路陕西南路口平安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咖

啡馆门口去等候。出乎意料之外,来和我接关系的却是梅益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因为他曾是苏北根据地江淮大学的党代表,我是他的学生,两年前在根据地朝夕相处,十分熟悉。那天,梅先生一反他以前灰布军衣军帽的装束,身穿一套深蓝色笔挺的西装,浅蓝色领带,高高的个子,金丝边眼镜,头发整齐油亮,看上去像是一位教授或者银行经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进咖啡馆里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梅先生低声传达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任务:“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指示要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要在上海出版一张《新华日报》,等国共谈判一结束,立即公开出报。现在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你就是调回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我听了又兴奋,又感到新奇,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

《新华日报》筹备处就在外滩附近一条很狭窄的溪口路(原名朱葆三路)的一座大楼里,租了三四间房,不几天,打字机、纸张、办公室都准备就绪。那时不能公开挂出《新华日报》上海版的招牌,为了掩护和争取读者,我们先借用抗战初期在上海和广州、桂林出版拥有大量读者的《救亡日报》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出版,每天出八开报纸一张。筹备处一共不到十个人,仍由原《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和梅益带领几个年轻人负责编辑采访工作,原重庆《新华日报》经理徐迈进到上海来负责出版事务。我的任务是将外侨办的《大陆报》、《字林西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上可以采用的文章、消息、评论翻译出来,供报纸采用,兼作采访和接待外国记者时的翻译。

《建国日报》1945年10月10日出版,给上海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抗日战争初期它就在上海创刊,在上海和大后方有很高声誉。报上有特色的栏目,是非鲜明,立论犀利,很受欢迎,每天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梅益和夏衍负责编辑、写社论、看大样,每天来到办公室就坐下来议论当前的形势、需要写的言论,边思考、边下笔,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成时评、小品和杂文，分别刊载在报纸的几个专栏上。他们思路敏捷、下笔很快，真使我钦佩不已。夏衍先生那时并不是以党员身份出现，我只知道他是有名的电影家和剧作家，读过他的不少剧本，很喜欢他的作品。梅益是著名的翻译家，我们不少人都读过他翻译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想不到他们都还是出色而老练的新闻工作者。徐迈进刚由重庆调到上海，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党，一直从事统战、文化工作，他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经理，有丰富的白区工作和办报经验。我这个刚进入新闻队伍的新兵，能在这些老同志领导下工作，真感到幸运。

编完稿件，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梅益十分健谈，那浓重的广东乡音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说自己怎样在家乡潮州接受进步思想，十七岁离家到北平读书，出不起学费，只能在中国大学旁听，课余就到北平图书馆自学英语，读语法书，拼命记单词，苦战好几年，才能在1942年翻译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巨著。夏衍比较沉默，但说话很有风趣，他知识渊博，笔头很快，常常在短短的时间内边思考，边下笔写出短小精辟、三言两语式的时评。发完稿，大家就到楼下附近小摊子上吃馄饨、肉丝面、汤团当宵夜，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徐迈进的家属也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处有困难，我就请他们一家五口都住在我南市的家里，在客堂里搭起行军床，铺地铺，虽然很挤，住得也很高兴。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重庆谈判的进展，盼望《新华日报》上海版早日挂牌，与上海人民见面。谁知风云突变，重庆谈判的进展不大，公开出报的希望越来越小。《建国日报》创刊半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从重庆撤到南京梅园新村，在上海思南路设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梅益被调到中共代表团，以发言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朱葆三路周围特务暗探密布，我们的行动也都被监视。可是大家毫不畏惧，每天照常去上班。我们仍抱着时局能好转的一线希望。1946年6月，国民党向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时局严重恶化，朱葆三路筹备处办公室被强占。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奉命转入地下，化整为零，继续战斗。

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徐迈进突然来到南市小南门我家里，态度严肃又镇静。他告诉我

们党中央决定代表团撤回延安，他也随周恩来同志撤退。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又有家可以掩护的同志留下，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继续战斗，我和我丈夫还有其他两位同志都留在上海。他就是奉命前来告别和布置工作的，还交给我们一个扎得很紧的小包和几颗图章，郑重地说：“这是党的文件，你们要千方百计保存下来，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毁掉。”临走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党中央估计至多两年，局势肯定会好转，你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收下文件，像传家珍宝一样地保存，准备迎接另一个暴风雨的到来。

建立家庭地下印刷厂

地下工作是一个无形的战场，不见枪炮，不见士兵，可是天天却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表面上，敌人在明处，掌握着主动，可以随时搜查、逮捕，我们在暗处，只得隐避、躲藏，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却在明处，看中敌人的“弱点”，主动出击，我们时时刻刻地在观察敌人的动静，等待时机出击，取得战果又迅速隐蔽。夏衍、梅益、徐迈进他们撤退后，我们就由上海地下市委派同志单线联系，市委决定用油印刊物继续给外界传递党中央的信息。那时，延安新华社已向全国发布电讯。市委通过设在时代日报社内的电台，将收录到的电讯转给我们，由我们党小组承担传播红色电讯的任务。

我们这一支新闻轻骑兵只有四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组。编辑、翻译、刻写蜡板、打印、分发都包下来了。中文组是侯忠澍、方琼，英文组是我们夫妇两人，英文电讯稿呼号是XNCR。每期出十六开大小的油印宣传品，每期四至八页，内容有党中央的指示和消息、评论。侯忠澍将上级交给他的电读稿由方琼刻写好蜡纸、印刷后送到我家，再由我们两人翻译成英文，打在蜡纸上，油印一二百份。我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中文组）、一台英文打字机（英文组）和两台手摇油印机（中英文组各一台）。我们的住处就是办公室和印刷厂，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小南门乔家路，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是我婆婆工作的中国企业银行的家属宿舍。那幢三上三下的旧式石库门房，东西

两厢房,中间是客堂,门前有一家木匠店,环境十分隐蔽。我们就住在楼下客堂间和东厢房。楼上是银行租给一家私人摇袜厂,有几台摇袜机和十来个女工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摇袜机的咔嚓声和女工们边摇袜边哼歌的声音虽然十分吵闹,却正好掩盖住楼下我们卧室里发出的打字、印刷的声音,消除了邻居对我们的怀疑。

为了维持生活和掩护的需要,我们白天都找了不同的职业去上班,晚上就翻译、刻钢板、打字、油印……工作到半夜,甚至

通宵。我的丈夫在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任视察室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视察员中有一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批斗,受迫害后回到美国),他经常跟着李敦白视察崇明岛、复兴岛的码头和仓库,了解物资储备情况。晚上工作回来就伏在桌上翻译、打字、印刷。我在亲戚开的福安保险公司当秘书,后来因为怀孕只得辞职,全部时间就投入这家庭“地下印刷厂”里。

油印电讯分发对象是在沪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团体。我记得有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美国新闻处副处长金仲华、英文《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可别小看这一份油印的电讯小报,在当时消息完全被封锁的上海,它传递了共产党的方针,介绍了当时解放战争的信息,使那些同情、支持我们的党外人士、外国朋友和新闻媒体都能及时了解真情,通过他们再将消息传出去,争取国内外进步人士对我们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李敦白和一批外国记者曾先后到解放区延安去参观访问。我曾经奉命到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去和一个美联社姓马丁的记者联系,帮助安排他访问延安。

我们既是油印员又兼作投递员。收信人名单是上级指定的一些团体、个人,但是发信人地址如果都写“内详”或者不写地址就丢入邮筒,时间长了数量多了就会引起邮局以及特务机关的注意。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我们两



文革后原上海地下党部分老同志合影留念(左起:梅益、张承宗、夏衍、于伶、姜椿芳、刘厚生)

人上街查看马路上的门牌号。上海门牌都是由东向西排列的,但中间也有跳号,我们就将漏号一一记下来,编成一份详细的地址表,例如南京路最末的门牌号是1858号,我们就编两个南京路1866号和1870号,信封上看不出破绽,实际上却是子虚乌有的。这样,我们编了好多个无头地址,写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信封上,一个时期更换一次,分别投入各个邮箱,都会顺利地送到收信人手中。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在邮筒后等着,立刻警觉起来,骑车飞快地混入人群避去。此后,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决定另由专人去投递,我们只负责编辑和印刷。有一次我们的投递员被特务盯梢后被捕。因为是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从而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级决定改变形式,停止印发油印材料,成立了一个对外宣传小组,组织上派王楚良来单线联系。这个组五个人都是大学生,会英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传达文件,讨论形势,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外报和刊物上去发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

铁骨铮铮

第二年,地下市委派姚溱来同我们小组联系,他经常到我家里来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姚溱是个年轻而极有才华的笔杆子。他当时用秦上校、马里

宁、萨利根等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写“半周军事述评”和在《消息》、《展望》、《文萃》等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时事评论，深得读者的欢迎。我在淮南根据地时就认识他。1948年10月某日，我在英文《字林西报》上忽然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在威海卫路和陕西南路口的一座楼里，破获了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一个共党分子突然从二层楼临街的窗口跳下，因为脚骨受伤当场被捕……”我看了心里非常着急，不知道谁又遭到毒手。傍晚，姚溱的夫人韩静来我家，告诉我姚被捕了，组织正在设法营救。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过几天，得知姚溱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受特刑庭审查，我们就托韩静送去了一些衣服和罐头。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姚溱被捕的详细经过。那天，姚溱正沿着石门二路向北走，忽然发现有一辆吉普车紧紧地跟着他，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被特务盯上了，赶紧拐进一条弄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吉普车戛然而停，跳下三条大汉，其中一人是从新四军逃出来的叛徒。三个人把姚溱挟上车开到陕西南路二号中统特务上海办事处。姚溱经受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只承认是《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可是他担心的是自己被捕没有人知道，有关同志不能及时隐蔽。为了向外报警，急中生智，趁特务一时疏忽，猛地从二楼窗口跳了下去，刚好落在马路边一辆老虎塌车夫身上，砸伤了车夫，自己也受了伤，又被送到提篮桥监狱。他的下肢和腰部受了伤，但也确实起了报警作用，组织上立即展开营救，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1948年秋到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大军准备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上海人民也加紧了镇压，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也经历了一次虎口脱险。4月1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任教的南洋女中进行搜查和逮捕，由于我平时言行比较谨慎，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没有暴露身份，特务搜查时，我又镇静应付，终于脱了险。我立即回家清理了文件，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到我大姐家隐蔽起来。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我奉组织命令立即到汉口路山东路口原《申报》馆报到，参加出版《上海人民报》，报上刊登《告上海人民书》，宣告大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的喜讯，迎接解放军进城。在那里，我同从监狱里出来的姚溱见面，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两天后，我们一批地下党

调集的同志迎来由范长江、恽逸群带领的新闻队伍接管《申报》，出版了第一份《解放日报》。我被分配在国际部当编辑，于是我从“地下”钻出来，当了一名正式的新闻工作者。

1949年10月建国后，梅益、夏衍、徐迈进、姚溱分别在宣传、文化、新闻、出版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又都到了北京。昔日的深厚革命情谊和对他们的敬爱，使我每次到北京出差时都要去看望他们，叙旧问好，也都像过去一样，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和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恶浪中，我更是想念他们。那年夏天，我在外地的一所大学教书，学校停课，我随学生到北京串连时，到中宣部去看大字报，只见姚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姚任中宣部副部长），给他扣上叛徒、特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一大堆帽子。我十分担心他的处境，却无从去探望。不久就听到他的噩耗，这位在敌人屠刀下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不愿在横暴势力下低头，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当时他只有四十五岁，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好时期。“文革”后期，我曾到徐迈进家里去探望他和夫人方琼，他也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囚禁多时。老人家佝偻着腰，步履艰难，但是精神很好，他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生国民党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尝过味道。对比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牢难熬，吃足苦头。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组织难友学习，反抗，精神上充满希望，共产党监牢写不完的检查，冤气难忍……”“文革”后，他一度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我见到他，豪情依然不减当年。在社会科学院见到梅益，简直令人不敢信，当年身材魁梧的梅益老师，因腰椎被打伤，人矮了半截，支着拐棍，步履蹒跚。我问他：“梅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朱葆三路办《建国日报》吗？”他爽朗地答道：“记得，记得，那时的环境真艰苦。但是大家却信心百倍。”

梅益先生在晚年为筹建社会科学院、出版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又奋战十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衍先生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目损肢残，依然精神抖擞，重又走上文化、电影和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直到95岁高龄仙逝。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侨居海外）

（责任编辑 李晨）



青年时代的陈子谷

狱友陈子谷

● 季音

岁月无情,当年上饶集中营的老战友,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在去世的故人中,我最怀念的战友之一,就是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陈子谷的一生十分曲折。他原是广东汕头港外南澳岛一家渔民之子,由于家庭贫困,孩子众多,他很小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旅居泰国的商人陈崢嶸,从此成了陈家的长孙。子谷的少年时期,是在祖父钟爱下在曼谷度过的。在他13岁读完高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进步思潮也传到了泰国,不属于过优裕生活的陈子谷向往着祖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偷偷地背着家人回到了祖国,先后在汕头等地读完初中高中。1932年他又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进步学生中,东渡日本探求新思想之风甚盛,1934年子谷也来到日本,很快就加入东京由一些地下党员组成的“左联”日本分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左联”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1935年秋,子谷被东京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回国后,继续投入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子谷一生中的转折点,是1937年底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不久就来到战斗在苏南敌后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40年是新四军十分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当局大肆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

策,停发了新四军的薪饷及其它一切物资,部队经费十分紧张,连将士们的吃饭和穿衣都成了问题。就在此时,子谷收到泰国两个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去世,留下的遗产要作三家分,按照泰国的法律,遗产继承人如果没有到齐,那是不允许分的,因此要陈子谷立即回泰国处理此事。他把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报告给组织上,叶挺军长闻讯,立即同意,并要子谷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向泰国爱国华侨界为新四军募捐。

子谷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泰国,顺利地完全任务。他从叔叔那里分到了20万元国币的遗产,又从爱国华侨中募集到6万元捐款。当年,他就回到新四军,把26万元全部上交给军部。这笔巨款的到来,顿时使部队走出困境,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衣问题。叶挺军长十分高兴,写了个条幅赠给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确实生动地概括了子谷的精神境界。这里还要附带说几句:1956年,子谷又收到从泰国寄来的4万元人民币遗产,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北京市委,而他和家人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不幸,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人之众,在新四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然袭击,围攻仅9千余人的新四军。在惨烈的战斗中,陈子谷最终被俘。

不久,他和几百个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勇敢斗士

我是在上饶集中营里和子谷相识的。那是1941年5月间的事。

上饶集中营里的被囚者共700余人。编成6个队,其中有一个队叫“特别训练班”,主要由被

俘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所组成。我和陈子谷一起被关在特训班。共同的苦难生活,很快使我们由相识而发展成相知。子谷比我大7岁,当然是我的大哥,他对我这个17岁的小难友特别关心,我们常常在背地里倾心而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新四军干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一起震动集中营事件,更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特务百般折磨被囚者,各种各样的毒刑,没完没了的苦役,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屈服。同时他们也演出所谓“听课”的丑剧,搬来一些国民党的反共专家和名流,来给“囚徒”们上课,企图以此给被囚者“洗脑筋”,摧毁被囚者的革命意志。这些反共名流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丑态百出,成了我们背后谈话的笑料。这里就不去说它。有一天,集中营里又宣布“上课”,请来的是一个名叫姜移山的人,据说此人是第三战区著名的反共专家,他在讲台上破口大骂“共产党最不爱国,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本人,到处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了一大通反共八股之后,得意地准备走出会场,不料,队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大声抗议:“姜教官,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共

产党是最爱国的,我们新四军在皖南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繁昌战役,泾县大捷,消灭了大量日军,活捉不少俘虏,我本人都是亲身经历的,……”姜移山听了,一时惊得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这个勇敢的抗议者就是陈子谷。

这种当堂顶撞教官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会场上顿时秩序大乱,特务队长们慌了手脚,特务班队长王寿山狠狠地把陈子谷拉回队列里,匆匆把队伍带回囚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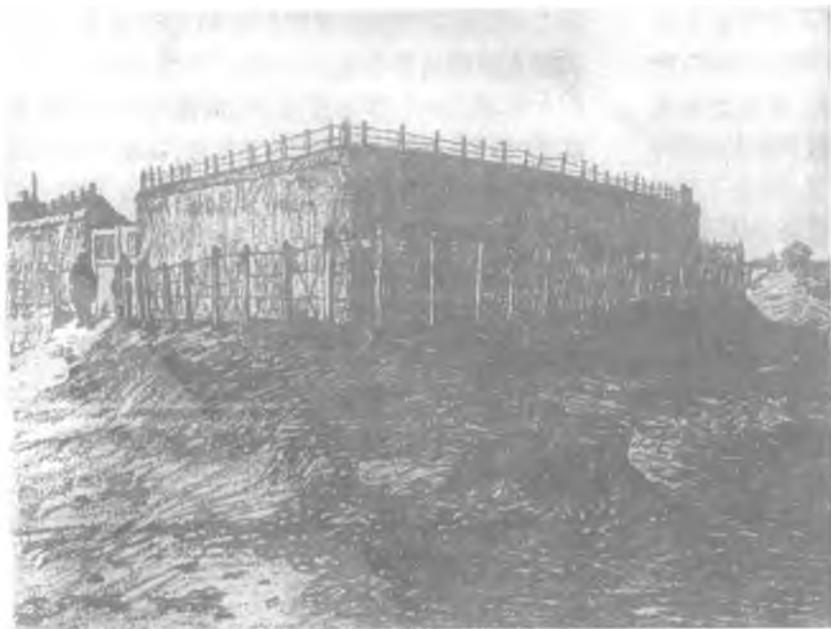
我既钦佩子谷,又为他担心。果然,当天下午,子谷被叫到集中营总部,由三战区著名杀人魔王、集中营总头子张超亲自审问,没说上几句,就令几个特务打手把子谷绑起来,押到集中营后的山坡上,长时间的轮番毒打,把子谷打得满身血污,遍体是伤,几乎死去。最后因为他已不能行走,就由几个特务将他装进一个箩筐,抬到了茅家岭监狱,关押起来。

茅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关押斗争坚决的同志,对他们施以种种骇人听闻的毒刑。子谷由于伤势过重,在囚室草铺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十余日,经过战友们的悉心护理,才逐渐康复。

1942年5月26日傍晚,茅家岭监狱26个被囚同志趁特务管理疏忽,举行了集体夺枪暴动,陈子谷是暴动领导成员之一。他像个勇猛的战斗士,冲进卫兵室,拿了4个手榴弹,与战友们一起冲出了牢狱。这次著名的茅家岭暴动,是党的监狱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子谷越狱后,又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颠沛流离,终于在1943年8月回到淮南敌后新四军军部。

命运似乎对子谷特别严酷。不久他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那是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投降,时任新四军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之子谷,奉军部之命,秘密前往南京商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在中途被伪军拘留,投入苏州监狱,关了近一年,后经过他的坚决斗争和党的营救,1946



上饶集中营(邵宇作)

年7月出狱,回到军部。

在以后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子谷又做出了杰出贡献。1947年1月间的莱芜战役中,他奉命冒着极大危险潜入国民党军第49军营地,与同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军长韩练成秘密会谈。最后韩练成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放弃指挥出走,敌阵大乱,李仙洲集团军6万余人全军覆没。在这次山东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中,无疑有子谷的一份功劳(按:韩练成将军解放后于1950年入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爱国功臣被打成右派

解放后,子谷满怀喜悦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初,他被调到北京,奉命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他和其他几位筹建负责人一起,经过一年努力拼搏,当年底,新中国第一座地质系统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他最初任总务长,后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1957年春,一场灾难开始向他走来。这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是以整风形式拉开序幕的。共产党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地质学院也同其它单位一样,经过一再的动员和号召,不少教职员工纷纷对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前几年地质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扩大化情况,整错了一些知识分子,后来虽然都得到平反,但他们心里有些怨气,这些人意见就比较尖锐。作为党委书记的子谷,以为党提出的整风号召是真心实意的,完全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整风会上,他虚心听取教职员工的各种批评建议,认为有些教师意见比较激烈,是由于过去受了委屈,也应当谅解。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子谷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各系分别抓出一些右派。他一方面不得

不执行上级的部署,违心地加入斗争,内心却十分不安,认为这种做法很不道德。过于真诚的子谷毫不掩饰他的这种心情,一再叮嘱工作人员,抓右派一定要慎重,千万不可整错人。有几个已经被定为右派的人,虽然在鸣放中说话有些过激,也是出于善意,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子谷的这些话引起了某些反右积极分子的不满,认为党委书记“右”了。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转入一个新阶段,提出要反对“温情主义”,不要放过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社论,文中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社论的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一样。地质学院的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响应党发出的抓党内右派分子的号召,随即向党委书记陈子谷发难。

1958年,子谷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是“卖党求荣”,结论上说,一个党委书记居然当众向对党不满分子赔礼道歉,而且自己推诿责任,这不是“卖党”吗?至于“求荣”结论没有举出任何例子,在子谷的一生中,你能找出哪怕是一点点追求富贵荣华的影子吗?在我国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者照例是没有任何申辩权的,尽管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

子谷被划成右派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西山参加植树劳动,听了简直不敢相信。据说,消息传到陈毅副总理那里,老总连连跺脚:“陈子谷怎么是右派呢?”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听了,也不断叹气。但谁也救不了子谷,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何况右倾“温情主义”离右派并不远,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告诫声犹在耳边,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去给陈子谷说话呢?

子谷被划为右派后,即开除党籍,下放河北地质局所属怀安县右所堡磷矿区劳动。他在劳动间隙,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写申诉信,要求复查他的冤案。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1959年到1961年的农村大饥荒时期,子谷在张家口地区的地质队劳动,地质队与农民接触多,他看到一些村子里浮夸风十分严重,连农户的口粮都被征光,不少农民活活饿死。子谷再也沉不住气了,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头上戴着右派帽子的反党分子,连续给张家口地委领导写信呼吁。当然,地区的官员们哪会理睬这个已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者发出的呼声。

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

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按需出版

我公司自2004年开展按需出版业务后,深受广大作者的欢迎。四年来已经为300多位作者出版了他们的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台湾等海外作者服务,出版了他们的著作赠送大陆亲属友人。成为最有品味的礼物和独到意义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它有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游记老辈遗作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资金投入:自费。以20万字288面、规格大32开本为例,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彩色及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单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085,

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邮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

● 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置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句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

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敢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周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

● 李 锐



抗战时期的牟宜之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不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

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

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

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呻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情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躯軀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

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中,乐观豁达的句子几乎随处都有,信手拈来,如“良辰乐事难兼有,白发青衫益放歌”;“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长啸放歌豪情在,旋身起舞亦从容”。作为在那边陲流放,举目荒凉日子过来的人,从内心深处体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真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写诗,在做人。

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之际,或文革中非人岁月里,诗人也从不乏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达不贵,穷不悲,名利地位如过眼烟云。抗战“反扫荡”中的诗句:“微闻妇孺低声语,指点斯人似是官”;“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等,表明在枪林弹雨中是何等从容淡定。

在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中,流放绝域边陲,不知情的当地造反派肆意批斗朝廷钦犯,诗人却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请读1966年的《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杆百丈冰。
窗外时间闻山魃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1967年的《荣枯过眼》:

当年无路请长缨,空负胸怀百万兵。
十载坎坷十载恨,旧时风物旧时情。
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忆昔抚今无限慨,荣枯过眼一身轻。

1970年的《阅尽炎凉》,更表现得如此怡然自得,怡然自乐:

阅尽炎凉挺此身,几年边塞作离人。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
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
向隅背人窃自笑,狷狂本性未知辛。

诗人做人襟怀坦荡,充满自信,不拐弯、不掩饰、不装谦虚和假谦虚,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诗句:“经纶堪作帝王师”、“空负胸中百万兵”、“当年随手掷千金”、“大漠孤芳偏自赏”、“功高何必感物华”、“吟罢静思石为玉,诗成喜见笔生花”。而且在“和黄兄万里”的长诗中,向至交表达了此种心态:“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学习马列水平低,路线是非难以辨。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迷途已远不知返,悟以往之何以谏。”就是这样一副铮铮铁骨:站不清队,索性不站;学习也提不高,索性不学;既然已远入“迷途”,索性不返,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是何等的率真,何等的值得敬仰!

在林彪坠机身亡之后,藉此事件,诗人终于用纵横历史的眼光写下了《咏史》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现录其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封建传统专制体制下的权贵之间的厮杀,与躬耕陇亩中的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要拿百姓说什么事。更何况千古立废,宫廷争斗是历史上循环往复之事,早已司空见惯。此种史观是何等的深刻!

再看其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有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

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的,实为凤毛麟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志士仁人的思想,确是贯穿在牟宜之诗中的一条主线。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与痛恨,对真理与正义的向往和追求。“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常立擎云志,效力在疆场。”“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心系社稷不能拔,老来还要请长纒”。“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这些诗句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上述情感。还有两首诗抄在这里:

一是1970年秋天所作的《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穡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二是1974年的《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历经劫难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候。

相信读者自当感到,这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文革”的深刻认识,只恨苍天已死,回天无力!他预测到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绝不能长久;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没能看到“文革”的结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激情、坚持正义和学问高超的人,为什么不被时代所容啊!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命题,也是我们终生努力要破解的命题。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还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其民主性、人民性、正义性和科学性品位极高。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诗集得以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与纪念。我的八十八岁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从《牟宜之诗》中可以得出:宪政大开张是迟早的事。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情结,如同封存的老酒,随着时代的演进,定然能放出醉人的醇香。

2008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坐失机遇 预备立宪百年祭

● 王铁群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年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



慈禧

光绪

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曰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钟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

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

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 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开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 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

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开展。

6. 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中央官制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7. 实行君主立宪

1911年11月3日,清廷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布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十九信条》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限制,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实际上这是一部议会君主制宪法。后来的一些宪法学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56页)。“《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桡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15页)

三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即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在选举方面。民主选举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

是民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出的议员既有读书人，也有从政者和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具有问政的能力，质询、辩论，有声有色。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对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选举评价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转见傅国涌：《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竟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即以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

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资政院和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履行起民主制衡和监督职能，行使起三权分立之一权，绝非今人熟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议院法要领》规定了“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等权力，1911年预算案，资政院的议员们行使权力，详细审核，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了预算监督。一个在华的西方记者观察说：“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675页）省咨议局亦然，如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对督抚代表的强势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抵制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则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再如1911年湖北、四川等省的咨议局领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等。这些机构还组成联合会，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如1910至1911年由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总之，资政院和咨议局成为制衡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行动表明它们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

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

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1906年9月16日)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经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站在主流之上

一个政商精英,
只有放眼天下,胸怀国家,
突破昨日的“级”限,
才能步步为高。

一本资政杂志,
只有博采众家之长,
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阅读,
才能傲立潮头。



《资治文摘》月刊,16开全彩印刷
单册定价: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
邮发代号:80-366
国内刊号:CN11-5609/C

资治文摘

一本高端资政杂志,为数百万政商精英服务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 邮编:100005 热线电话:010-58689888 010-58689890

读者来信摘登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文章《我打谷志有》。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少有一篇作为当事人忏悔和反思“文革”的文章。

作者当时是插队到陕北一个叫余家沟的村庄的知青。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每个生产大队都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他们村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不幸被选中了。作者是这样描述打人过程的：开完批斗会后，队干部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荫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作者后来反思道：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结，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

我很佩服作者这种勇于自揭伤疤的道德勇气和忏悔精神。

反观我们对建国后前赴后继的运动浪潮，从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浩劫”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除了刚刚粉碎“四凶”的时候，国人一片声讨声之外，也清算了一些所谓的“三种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提“文革”，即使谈到“文革”，很多人也都是一脸无辜，好像所有的罪恶都是“四凶”和“三种人”的事，所有的揪斗、告密、揭发、喷

气式、阴阳头都与自己无关。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患了集体失忆症，或者是单相度失忆症，只记得所遭受的迫害和打击，不记得自己也曾经亲自写揭发信告密，亲自动手打人，亲自举起手臂要“打倒×××”，给别人带去的伤害。说到责任，那是时代的问题，与我无关，或者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和历史责任，更不必承担道义的责任。

笔者想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

1997年10月，70年代曾担任德斯坦政府预算部长的帕蓬，由于二战期间在通敌的维希政府时代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而受审。二战之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法国人都将维希政府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雪藏。但是，往事并不如烟。那个政府曾将7.6万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仅2500人幸存。那累累白骨和浓浓鲜血又岂能被时间的尘埃掩盖？

真相大白后，有舆论认为，迫害犹太人的是纳粹，是维希政府，帕蓬只是一个上级命令的执行者。但1995年出任总统的希拉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法国在迫害犹太人方面“铸成了无法补救的大错”。1998年4月，波尔多重罪法庭以“同谋反人类罪”判处帕蓬10年监禁。

这是时隔半个世纪后，法国人对“法奸”毫不留情的“清洗”——只要你成为了人民的公敌，只要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论时隔多久，不论隐藏多深，正义和公理之剑还是会准确地落在他的头上。

此案结束后，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向犹太社区道歉，他们承认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不只是少数人的罪恶，而是一种集体性罪恶”。

是的，“少数人的罪恶”只有通过“大多数”的身体力行，才能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罪恶”。诚然，“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确实只是一个执行者，或者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免除具体参与者的、个体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侵华日军是在以“圣战”

的名义屠杀中国人，军队作为国家机器并无罪过，但是当它整体沦为杀人机器时，每个参与“圣战”的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就必须接受正义和法律的审判。

“文革”时的举国疯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忆犹新。整人，被整，揭发，被揭发；人人自保，又人人自危，制造恐怖，又掉进自造的恐怖的漩涡中……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地忏悔和反思：仅仅是专制制度和盲目崇拜才导致了浩劫的发生吗？即使是红色恐怖和洗脑后，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和道德操守也同时泯灭了吗？

不仅不忏悔，还有人公开宣称：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其实，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忏悔过，比如也曾和当年许多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但那忏悔是扭曲、畸形的忏悔，是在政治淫威和强力高压下被迫作出来的姿态，是为了苟活不得不自我作践和自我侮辱。沙叶新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一个真正具有反思和忏悔意识的民族，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能够清醒地看到曾犯下“集体性罪恶”的民族，才有可能对发生的罪恶产生抗体和免疫力。同样，一个人如何面对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将决定他是重蹈覆辙，还是走上自新之路。

作者最后也反思到：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这句话，极其深刻。

北京读者 含辛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文中，七次点名我的亡妻陈葆华。为此，现提出四项更正。

- 一、牛文将陈葆华的名字错写为“陈宝华”。
- 二、陈葆华从未担任过聂元梓的秘书。
- 三、事发当晚，牛辉林等红卫兵带着吴溉之两

子女的大轿车到了“校文革”组织组时，陈葆华才知道是要扭送吴的两子女到中央。她是为了防止出事，才自动乘上大轿车随红卫兵们一起出发的。此前陈葆华对此事一无所知，更无牛文中提到的：陈葆华向牛传达“聂元梓要到哲学楼亲见牛辉林”、陈葆华“随同聂元梓到红卫兵总部办公室”的事。陈葆华既乘上大轿车，自不可能“是和聂元梓一起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去吴溉之家。

四、在牛辉林等抄吴溉之家的全过程中，陈葆华为了怕出事，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观察他们抄家活动的。她根本没有可能如牛文所述，陈葆华往来于聂、牛之间，向牛传达聂元梓下达的什么“任务”或指示之类。

米桂山

贵刊2008年6期《请理解老一代——怀念李慎之》一文，有2处明显的错误。一是该文第27页左栏第6、7行：“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二是第28页右栏第2自然段第3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事实上，李先念的家乡是湖北省红安县，红安县北面的邻县是河南省新县。改革开放后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黄火青。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贵刊作为全国有影响和知名的杂志，一篇文章中出现2处明显的硬伤，编审人员竟未发现，实在令人遗憾，也使该文的质量打了折扣，望贵刊加强编审工作，提高编审质量，尽量少出现差错。

汪一江

更正

我刊2008年第10期杨继绳一文中“霍维德、宋良成右倾反党集团”，“宋良成”应为“孙、陈、梁”（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

2008年第12期黄宗江一文中提到的阳翰笙应为四川宜宾高县人。

2009年第1期王贵胜一文中所提西安事变时间有误，应为1936年。

2009年第1期牛辉林一文中提到刘亚楼和吴溉之都是湖南老乡。此说有误，刘亚楼是福建武平县人。

欢迎订阅2009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传真：（010）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

李锐：读牟宜之诗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